

道家学风浅议

萧蕙父

道家之学，源于柱下，依附隐者，流播民间。在先秦，已蔚为南北诸流派，旨趣不全相同。但道家诸派，皆祖述老聃，阐扬道论，以其特有的思想风骨和理论取向，轻物重生，反抗异化，主张反朴归真，追求精神自由，从而形成了道家独特的共同学风。

道家学风的突出特点，是以“道法自然”为理论重心，力图探索宇宙万物的本原。道家基于整个气化论的自然哲学中，“道”成为最高范畴。“道”被规定为“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具有根源性；“道通为一”，“道无委始”，“道未始有封”，即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道”不具有实物性与时空形式，因而具有超越性，“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即不可能被感觉和理智所认识，而只能通过“徇耳目内通而外于心智”的特殊方式去体知。道家在理论上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提出并论证了“外于心智”的体知（“夫体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系焉”）是一种什么样的认识机制。

道家从两个方面展开它的论证，一方面，由自然哲学转向社会哲学，早期道家力图通观人类社会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及其二重性，并着重揭露了文明社会所出的争夺、祸乱、虚伪、罪恶以及种种违反人性的异化现象，“以仁义易其性”、“危身弃生以殉物”，乃至“与物相刃相靡，其行进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荼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不死，奚盖！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为了克服和扬弃这一切伦理的、政治的以至人性的异化现象，道家提出个人修养与社会改革以使人性得以复归的途径。诸如：“专气致柔”、“涤除玄鉴”、“爱民治国，能为无为”等等，破异化以复人性，以达到“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朴”的境界，“常德不离”，与道合一。这是凭主体能动性可以追求、可以实现的理想目标。《庄子》中庖丁解牛、轮扁斲轮等故事，更生动说明“以神遇而不以目视”这种体知，在日常的生活、生产实践中都可能实现。

另一方面，道家以贵己养生、全性葆真为立论的基点，因而由自然哲学转向生命哲学，取得重要的研究成果，不仅对中国的医药学、养生学、气功学等应用人体科学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更重要的是道家对生命哲学的研究，并非局限于人体功能的实测或开发的层面，而是旨在追求“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的“真人”的“真知”，也就是从大宇宙（天）与小宇宙（人）、自然大生命与个体小生命的同构与互动的视角，探讨天人合一的途径，通过“营魄抱一”、“心斋”、“坐忘”等内在体验自证，达到“撝宁”——由“外天下”、“外物”、“外生”、“朝彻”、“见独”、“无古今”而“入于不死不生”——即逐步“体道”、“得道”、与道冥合的目的。

道家关于道论体系的建构和对于“道”的体知途径的探索，触及到了真正的哲学本体论问题，其所达到的理论深度，体现了道家的“大知”学风。

道家学风在方法论上的重要贡献，似可概括为通过相对主义而导向辩证智慧，由齐物论、齐是非、齐生死等破对待的追求，而昂扬一种可贵的超越精神。

承认事物普遍的相对性，避免认识上的片面、绝对和独断，是道家的慧解。“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坚持两点论，并认定对立的两者“相反而不可以相无”，互相依存、转化，乃是恒道。这是道家由相对论导向辩证法而达到对一般直线性认识的超越。

进一步，道家强调“别囿”、“去私”，破除各种条件造成的思想局限性。“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故应去其“成心”，突破局限。“弃知去己，而缘不得已，泠汰于物，以为道理”。这是对自陷于狭隘眼界和束缚于僵化教条所产生的局限的超越。

再进一层，道家注意到人类的理性能力及其认识活动与名言工具等，有其固有的根本局限。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不可道的“常道”，不可名的“常名”，不是一般认识和名言所能把握和表达的。必须进一步对整个理性认识的局限的超越，才能达到“从事于道者，同于道”，超越主客之分的局限，而置身于“道”之中，自同于“道”。这需要经过长期艰苦的自我净化，“致虚极，守静笃”，“堕肢体，黜聪明”，直到与道为友，“与道徘徊”，意识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道家认为，这是可能实现的一种精神超越。

不自陷于各种片面和局限，而能不断地开拓视野，不断地自我超越，这是道家学风的重要特征。

道家学风体现在学术史观与文化心态上，更有一种恢宏气象。从总体上与儒、墨、法诸家的拘狭、专断相较而言，道家别具一种包容精神。

早期道家对于“万物并作”、百家蜂起的学术争鸣局面，并非都很理解和乐观，甚至担心“百家往而不反，道术将为天下裂”，但他们基本上抱着宽容、超脱的态度。如老子提出“知常容，容乃公”的原则，主张“和光、同尘、挫锐、角纷”；宋铤、尹文提出“别囿”，主张“不苟于人，不伎于众”，“以聊合欢，以调海内”。庄子继之，提出齐“物论”、去“成心”，更从理论上论证“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而主张“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是之谓两行。”《秋水》篇等深刻揭示了真理的相对性、层次性和人们对真理的认识的不同层次都有的局限性，把人们引向日趋广阔视野，引向一种不断追求、不断拓展、不断超越自我局限的精神境界。这是庄子对道家学风的独特贡献。儒、法都把“道”单一化、绝对化、凝固化，故韩非曰：“道无双，故曰一”。孔子称：“朝闻道，夕死可矣。”庄子却说：“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庄子》上记载颜回对孔子毕恭且敬，称“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夫子奔逸绝尘，则回也瞠乎其后者矣！”而庄子却对后学说：“送君者自其涯而返，君自此远矣！”这显然是两种真理观、两种学风、两种文化心态。司马谈总结先秦学术时，正是从学风的角度赞扬道家能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以虚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物之情。”王充所坚持的“虽违儒家之说，但合黄老之义”的学术路线和学风，也主张像“海纳百川”一样“胸怀百家之言”，才能成为知今知古的“通人”。唐宋以来的道教理论家，在为道教的系统理论化建设中，更是依托老、庄学脉，阐发“重玄”之旨，大量地摄取儒、

佛各家思想，尤其大乘佛法的理论思辩。诸如“重玄论”之有取于三论宗的“二谛义”，“坐忘”论之有取于天台宗的“止观”说，而全真派更直袭禅宗学风，创始人王喆自称道教的最高境界也是“语默动静，无时非禅”。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称：“道家之术，杂而多端”，而《道藏》的编纂确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道教理论和学风的宏肆和兼容的性格。足见，道家、道教的学风及其对异己学术的文化心态是较为宽容、开放而具有广阔的胸怀的。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很值得加以发掘的优秀思想遗产。

(责任编辑 未名)

短 讯

“道家道教与中国文化学术研讨会” 在我校举行

为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促进两岸三地学术交流，我校宗教所与香港青松观道教学院、北大中国文化所共同举办的“道家道教与中国文化学术研讨会”，于1994年12月下旬在我校隆重举行。来自全国各地和台、港、新、韩、美的专家学者及道教界人士共150余人参加了会议，国家社科规划宗教组副组长、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我校宗教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卿希泰教授主持了开幕式。省人大副主任饶用虞、省政协副主席张廷翰、我校副校长王庭科教授及省市宗教局负责人出席了开幕式。莅会并在大小会上发言的著名专家有萧蓬父、卿希泰、陈鼓应、钟肇鹏、唐明邦、熊铁基、涂又光、王尧、王家佑、(台)徐冠雄、(台)李丰懋、(港)王煜和香港青松观道教学院院长侯宝垣、副院长罗智光、中国道协会长傅圆天、副会长闵智亭、陈莲生、台湾中华道教会秘书长张桎等。

(见 道)

宗教所卿希泰教授到台、港、新、韩讲学

1994年上半年，我校宗教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卿希泰教授先后应邀前往台湾、香港、新加坡、韩国出席学术会议并作学术访问，与四地的同行专家研讨、交流道教研究的新成果、新动向，并在四地作了学术报告或向有关专业学生讲授了道教文化课。此外，宗教所还有其他中青年教师6人次赴港讲学。

(见 道)